

## ※ 學界消息 ※

# 憶梅廣師

鄭吉雄\*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側聞梅廣師赴倫敦探望兒子的旅途中，染病逝世，半信半疑。旋知王安祈教授臉書已發布消息，幾位朋友也都輾轉證實，不禁黯然神傷。尤感扼腕的是，老師和我說好了，明年要將平生所撰儒學的論文整輯成專書出版，囑我協助。今老師遽逝，未來這件事要如何完成，難免困難倍增。幸十月三日接到臨生老師來信，論文集出版已有安排，心中稍寬。

老師對哲學、儒學有精深研究，更是成就卓著的語言學家。我真正開始與老師深入交往，可以追溯到一九八八年我以〈九與五的數字觀念及其與思想史的關係〉一文榮獲年度國科會乙種獎勵費，老師特別來系辦公室找我，詳細詢問我的想法，並分享他的觀點。二〇〇〇年起，我在黃俊傑老師主持「東亞近世儒學中的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大學學術追求卓越計畫）中提出語文學（廣義的 philology 包括文字、聲韻、訓詁、校勘學等）和詮釋學關係的重要性，黃老師就囑我代表總計畫邀請老師做專題演講，發表〈語言科學與經典詮釋〉一文。此文體大思精，由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 區分兩類「理解」(verstehen/understand) 談起，講到語言科學和哲學在中國經典傳注傳統中的開展，以及西方詮釋學家如利科 (Paul Ricoeur, 1913-2005) 對文本的解釋與理解等等（基於 Ricoeur 的文章 “What is a Text?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而討論）。我想引用該文的一段文字，說明老師的縝密考慮：

Ricoeur 認為文篇 (text) 屬於後者，因為文篇就是用文字「裝起來」的說話。裝起來的話離開了它的說話的時空人物背景，也跟說話者說話時的心理意向切斷了。嚴格的說，用文字盛著的文篇就已經不是說話，而是說的話——語

---

\* 鄭吉雄，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教授。

言。正因為是語言而不是說話，文篇可以成為合適的解說對象。事實上，結構語言學也是從語言表現為系統這樣一個基本假設建立起來的。語言系統——語音、句法、語意——可以孤立起來研究，這是語言學能夠成為一門嚴格科學的成功條件。語言理論可以根據自身結構特性的發展出來，並不需要向自然科學借鏡，倒是生命科學研究遺傳基因時還要取象於語言。語言的結構原則不但是人類的心理實體，很可能還是自然界啟動生命的玄紐。（原注：我國古代也相信人的現象和宇宙現象是相通的，所以中和的道理既反映在人情也反映在天地萬物。）文篇的解說必須包括篇章意義結構的分析。Ricoeur 指出，我們可以根據語言學和符號學的基本結構原則進行這個層次的分析工作，因為語言雖有層次之分，結構原理則是相通的。

Ricoeur「說話／文篇」的意思，約當中國傳統「言／文」的關係。「說話」（言）是當下發生的，有它的場景、語氣和老師所說的「心理意向」。當說話變成語言文字（說的話／文），已脫離了上述的脈絡，最後以“text”的形式呈現，也為「解釋」啟動了開放性。這正如人類日常說話，一般並不具有系統，但一旦「說話」變成「語言」，語言學家必須假設其具有系統，結構語言學才能成立，語言系統的各個部件也才能進行個別研究。老師話鋒一轉，指出「語言的結構原則不但是人類的心理實體」，等於直接指出「語言」不應僅僅被視為工具（很多批評戴震〔東原，1724-1777〕「訓詁明而後義理明」之說的學者，正是誤以為「訓詁」只是沒有哲理意義的「工具」），而應理解為人類心理的如如呈現。這種呈現可溯源於自然（自然界啟動生命玄紐），透過人類心靈實體、心理意向而流出，成為「說話」，然後才是語言文字——整個呈現就是一個哲學關聯。所以老師特加原注，引「中和」為例，指出這一對觀念成為文字能被研究，之前不但有「說話」的階段，而再上溯則既植根於人情，更是天道的本然。這就可看出，語言科學推到最後，仍不離「詮釋」的哲學意境。換言之，即使循語言科學的途徑研究篇章，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工具性的技術層次，最終仍需要貫通到心理實體，進而上達自然玄理。我認為，若不能同時具備深厚的語言學和哲學知識，尤其如沒有豐富的細讀經典的經驗，是很難看透這一層意思的。這正是老師讀書洞察力過人之處。閱讀作為一種藝術，也是一個道境，其深微也在於此。

一般師友可能會注意到，老師平常說話速度不快，甚至常帶遲疑，有時在演講時或讓聽者難以迅速掌握他的意思。我的理解是老師在說話時，其實不斷在檢查思

考及用語是否精準表達自己的意思。記得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五日，我主持了東亞文明研究中心第二次學術講論會，由老師主講，講題為〈讀《孟子》知言養氣章——一個文化鬥士的思想與政治之間〉，在場的一位學者提出非常尖銳的問題，質疑老師提出語言科學解讀經典的有效性。作為主持人，我雅不欲插嘴代答，但看到老師沉默良久而不回應，心裏不免著急。老師卻沒有任何不悅，對於該位學者不甚友善的態度，也只是微笑以對。據數十年來個人觀察，老師除了為錢新祖先生(1940-1996)打抱不平顯得略有動氣外，我從來沒見過、聽過老師嚴厲評論任何一人。他仰慕理學家，尤喜新儒學。而正如大家所知，新儒家學者言語或文筆常帶鋒芒，喜以義理責人。老師則總是溫厚謙和，不以道德批判者或正義審判者自居。面對複雜糾葛的世情，他似乎寧可謹慎，理解同情，淡然而笑，或沉默以對。與其說是「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語出《後漢書·黃憲傳》），倒不如用《易經》〈謙〉卦「謙謙君子」形容老師，更為貼切。

二〇〇三年「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成立，我在中心為「語文學與經典詮釋研究計畫」立項，並敦邀老師為計畫顧問，商議如何組成團隊合作研究。經由老師介紹，我有幸認識了清華大學中文系語言學家劉承慧教授。此後承慧兄參與了中心很多活動，我同時邀請朱歧祥、林啟屏、佐藤將之、劉文清等十餘位學界好友，共同探討先秦經典中的「行」字，最後由歧祥兄、承慧兄、楊秀芳老師和我四人，合撰了探討「行」字的論文。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九至二十日，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在臺大農化新館第四會議室召開「東亞語文學與經典詮釋學術研討會」，由老師擔任第一場主題演講，講題〈精讀的藝術——如何把《中庸》當作一篇文章來讀〉，這正是二〇二一年《《中庸》新編分章解義》的最初稿。翌日第二場主題演講則邀請該年在臺大訪問的北京大學蔣紹愚教授主講，講題〈語言中的文化資訊〉。二〇〇五年初農曆除夕，老師邀請了蔣教授夫婦、何大安、楊秀芳老師伉儷，以及我和內子敏慧，在仁愛路家中圍爐。那是一次溫馨而愉快的聚會。

其後十餘年，我持續在語文學和哲學詮釋上之關係的主題上努力，發表了諸如〈釋天〉等文章，理所當然和老師在思考上不斷交會。二〇〇九年我收到老師〈《大學》古本新訂〉一文初稿五頁，其中僅有幾條筆記。後來則發展成三十八頁的長文，刊登於《孔德成先生學術與薪傳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12月，頁117-154）。二〇一〇年五月又收到老師的長文〈內聖外王考略〉第二稿，定稿則至同年十二月收到，內容增補不少。但到了該文在《清華學報》新四十一卷第四期刊出

(頁 621-667)，已經是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的事，內容也大不相同了。我手上保存的下一篇論文是二〇一九年十月收到的〈中國文化中的道德與宗教〉，標題旁邊注明是「初稿」。第二年(2020年11月28日)收到的是經老師補入第五節的張亨老師(1931-2016)的遺著〈讀陶敬贊〉。如今卻已成為兩位老師的遺著了！

由於二十年來個人致力在語言學和哲學之間搭建橋樑，所以一直和老師緊密分享著研究心得，包括各種方法、進路和觀念的長短得失。二〇一八年七月我在山東大學《文史哲》發表了〈論先秦思想中的語言方法〉，其中討論了同屬名家的惠施(約 370-310 B.C.)和公孫龍子(320-250 B.C.)語言方法的異同。老師也在二〇二〇年三月在《清華學報》發表了〈《公孫龍子》：校訂、語義和解說〉(新 501 期，頁 7-60)。我們曾就其中問題交換意見，我也得以修訂了拙文。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我受邀返母系講「海外漢學發展的回顧與前瞻」，老師全程聆聽並就歐美漢學家的研究方法分享卓見，認為我推介的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和沙加爾(Laurent Sagart)的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在方法論上欲推倒既有語言學框架，實可商榷，並推薦我參考何大安院士大文：〈這樣的錯誤不該有：評白一平、沙加爾的《上古音新構擬》〉。當晚晚宴和母系同仁歡聚，老師非常開心，並預約我下次返臺北一定要去他家吃飯。更高興的是，當天收到老師題簽的《上古漢語語法綱要》(二版，三民書局，2019年)。老師將書親手交給我，立即問我關於《周易》著作年代。我回答：屈翼鵬(萬里，1907-1979)先生將年代訂於西周初年，但香港大學周錫馥先生認為最後成書於召穆公虎之手，即西周共和時期。老師囑我注意《綱要》第五章討論「而」、「然」、「斯」等字用法一節，其中顯示《周易》寫定年代不會太早，可能是在上古中期(春秋時期)而非西周初年。我們知道，語言、語法的探討，是辨識文獻年代的屠龍刀，因為語素特質(linguistic features)永遠是忠實的。經典用語絕不會忽然出現與其被認定之年代更早或更晚的用法。像老師所說，卦爻辭中「在一個質詞組或動詞組之後加語尾『然』，以表示某一種狀況或狀態」，乃至於其他幾個變式如「而」、「斯」等，既不見於《尚書》西周誥文，也不見於早期金文。這顯示卦爻辭寫定不早。從方法上講，這推論是確不可移。不過我也認為，老師說《周易》「最後編定時間……其上限恐怕要落到春秋時期」(頁 169)和屈先生及周先生的推論未必衝突，因為古籍的成書經歷數百年是常見的事，所以諸說可以放在一起考慮。值得注意的是，《左傳》所記二十二條筮例，遍及多個國家，其中占辭與傳本卦爻辭大多可相印證，相信春秋時期已有

一個相對穩定的《周易》文本流傳各國。

二〇二〇年一月我短暫返臺北，二十九日老師就邀請我和敏慧、東海大學周玟慧、臺師大國文系郭維茹及其夫婿張超琦、中央研究院語言所江敏華等，到仁愛路府上晚飯。當日是農曆正月初五，濃濃的春節氣氛，為愉快的晚宴更添幾分歡樂。

近年我因為密集整理和出版著作，有幸隨時從老師的研究中獲得靈感，並及時分享自己的新想法。剛出版的拙著《漢學論衡》中有兩個篇章討論「隱逸」，我們還在書信中就隱士的問題交換意見，主要因為老師為張亨老師補撰〈讀陶敬贊〉第五節時，有感於其高情逸志，對隱士志節深有領會，與拙著將隱逸置入歷史脈絡的解釋，頗相逕庭。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老師初撰成《〈中庸〉新編分章補義》（為準備演講的初稿），第一時間寄給我，信中說「《中庸》已整理完畢，了卻一件大事」，舒緩之情，溢於言表！老師囑我提意見，特別注明「包括任何錯字、用字、表達方面的改進意見」。我不敢怠慢，當日就寫了五頁讀後感，就「誠」、「中和」、「勇」、「微」、「喜怒哀樂」、「道路」、「鬼神、死生」、「誠者，物之終始」、「所以成物也」、「德性問學、廣大精微」、「《中庸》與《孟子》的關係等問題，一一提出思考角度，供老師卓參。細節在此不遑細述。我主要認為，老師分《中庸》為十章，與朱熹分三十三章、黎立武分十五章已大異其趣，將朱熹《章句》第二十七章上半部分移到新編第八章第一節（第三十至三十三章也移前了），也相當大膽，具創見，有個人鮮明學說體系，因此文章原題「補義」二字似可改稱「釋義」，當更為合適。老師則於五月二十日以長信回覆，表示他「自覺還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只是對朱說做了修正和補充」。由此可見老師一貫謙謙君子的態度。老師除了接受我的提議，將「微」從「微小」改釋為「隱微」（先秦「微」字多用為深微之義）外，也解釋了我對於《中庸》似沒有開展孔、孟所重視的「勇」觀念的疑惑。他認為，《中庸》的「強」（北方之強、南方之強、強哉矯）就是作者對「勇」的闡釋。這是老師的解讀，謹藉本文以誌之。至於我針對「誠」、「天道」和鬼神觀念的拙見，老師在來信中回應：「對『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二句始終感到困惑，恐怕不能把『天之道』與『誠』畫成等號，要是這樣看就太玄了。」老師最後表示：「非常高興與你討論學問。你的研究做得非常詳盡，不是我能比的。」這幾句話完全是長輩無私地對晚輩的愛護與鼓舞。能有幸在老師晚年時彼此深度論學，是我人生難以言喻的福氣，因為這個階段的老師常常透露出較早年更為深微的智慧，一種蘊蓄數十年人生閱歷的洞察力，難以言喻。之後我和老師也透過

電話進一步交換意見。〈《中庸》新編分章解義〉已在《臺大中文學報》七十五期（頁 1-54）刊出。

今年五月底我因家事返臺北一趟，打電話給老師。臨生老師告知老師在新竹住幾天。翌日我就接到老師電郵，邀我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到新竹府上喝茶。當日天朗氣清，我在高鐵上已接到老師手機簡訊。老師堅持開車來高鐵站接我，我從車站走出來，遙望已見老師站在路旁，笑容滿面戴著登山帽和太陽鏡等候，令我深感不安。從上車起，我們就天南地北，聊得興致很高。除了退休及寫作生活外，也談到仁愛路住所需要「都更」，老師和師母決定遷離的計畫。也因此我們特別談到出版《梅廣論學文集》之事。大概因為我編書經驗較多，而錢新祖先生的遺著又收入我和伍安祖主編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叢書》，所以老師表示有意將這部文集收入這部叢書，並請我屆時協助。

隨後我們聊的就是，今年秋天他將在東海大學徐復觀儒學講座中準備演講的內容，嘗試比較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和孟子 (372-289 B.C.) 的思想，因二人年代相仿，而同為東西方哲學巨人，可以在一個相近的坐標上，比較其特色、貢獻與意義。這樣的題目，正是學界所期待的。我們順帶討論了先秦諸子年代問題和相關研究，包括錢賓四先生（穆，1895-1990）、梁濤、李銳等的觀點，以及彼此方法的短長。我嘆說：「我將來到了老師這個年紀，還能有您一半的敏銳，於願已足。」之後老師就請我在附近午飯，吃泰國菜。

飯後老師陪我等計程車時，帶點傷感跟我說：「謝謝你專程來新竹探我。我能聊天的朋友愈來愈少了。張灝 (1937-2022) 走之前還常和他聊。你是另一位和我聊得來的，可惜你不常在臺灣，有機會回來一定聯絡我，我們多聊聊。」我慨然允諾，並因此特意在七月四日（星期一）晚在臺北春申食府安排晚飯，請了幾位好朋友作伴，除了李隆獻兄外，因六月二十二日我們聊起年輕一輩時，老師特別稱讚伍振勳和史甄陶，我就邀他們參加；現在中央研究院訪問的陳榮灼兄曾和老師在香港中文大學做同事，相當熟稔；陳祖為兄研究儒學和政治哲學，新獲聘於中研院，自然都應該和老師見見面。這個飯局就這樣安排了。

只是沒料到一個月前的一次晚宴，竟成永訣！今年我受新亞書院之邀，擔任第八屆新亞儒學講座。新竹之會，我向老師匯報了擬定的三個演講內容，因均屬近年新見，有點迫不及待希望獲得老師雅教。不意僅僅來得及簡述三講大綱，不旋踵而老師遽逝，遂令我這一段時期蒼焉若失。十月分演講前沉醉在文獻辨析，雖重新

興起「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感，卻失去一位深度了解我的師長賜予迴響，我的遺憾，也只能遙寄於八遐了。

2022年10月31日於香江御龍山寓廬



2019年12月11日筆者演講「海外漢學發展的回顧與前瞻」，老師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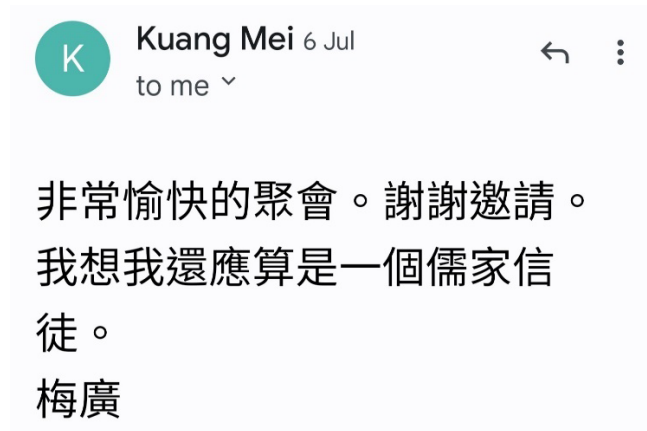


2019年12月11日演講後在春申食府晚飯。



2022年7月4日臺北春申食府晚宴。右起史甄陶、陳祖為、老師、陳榮灼、李隆獻、鄭吉雄、伍振勳。





因7月4日晚宴上都是研究儒學的，話題離不開儒學與經濟世務。7月6日收到老師這封信，其中透露了老師對儒學植根於生命的熱情。

